

18

鲁迅批孔反儒的斗争

陈鸣树

陕西人民出版社

0.96

鲁迅批孔反儒的斗争

陈 鸣 树

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国营五二三厂印刷
陕西省新华书店发行

1976年2月第1版

1976年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000

书号：10094·125 定价：0.42元

(内部发行)

目 次

第一章 辛亥革命前后时期的批孔反儒斗争	(1)
一、历史背景	(1)
二、“孔孟的书我读得最早，最熟，然而倒似乎和我 不相干”	(7)
三、“从旧垒中来，情形较为看得分明，反戈一击， 易制强敌的死命”	(13)
四、接受进化论 批判倒退复古论	(15)
五、开始用小说的形式批孔反儒	(24)
六、五四前夕在教育部任职期间的批孔反儒斗争	(26)
第二章 五四运动时期冲在“打倒孔家店”的 前列	(32)
一、历史背景	(32)
二、宣判孔孟之道是吃人之道	(35)
三、孔孟之徒都是政治骗子	(46)
四、将批孔与反复辟斗争结合起来	(54)
五、将批孔与反帝斗争结合起来	(62)
六、“打落水狗”的口号是对中庸之道的深刻批判	(68)
七、伟大的反孔战士挺进在阶级斗争的风暴中	(74)
第三章 在国民党反动派的文化“围剿”时期 的批孔反儒斗争	(79)
一、历史背景	(79)

二、击退“倒退的时代”	(84)
三、画出复辟逆流中形形色色尊孔派的丑恶嘴脸	(91)
四、鲁迅为什么重视《关于〈子见南子〉》一案?	(97)
五、用通俗民谣的形式进行批孔反奴化教育斗争	(105)
六、再批中庸之道	(109)
七、对秦始皇的正确评价反击了尊儒反法思潮	(118)
八、揭开“礼治天下”的黑幕	(125)
九、儒术——卖国贼的权术	(133)
十、撕破“王道”兜售者的画皮	(138)
十一、用马克思主义的聚光灯照出孔老二的丑态	(153)
十二、再刨一下孔孟之徒的老根	(161)
十三、鲁迅对章太炎的评价说明了什么?	(165)
第四章 批孔与反修	(175)
一、修正主义者为什么要乞灵于孔孟之道?	(175)
二、将批孔与反修结合的第一仗	(185)
三、痛斥“以‘孝子’之名”当叛徒的杨邨人	(189)
四、斗争哲学和奴才哲学的对立	(193)
五、一场反对借中庸之道进行卖国主义的大论战	(196)
第五章 学习鲁迅批孔反儒斗争的历史经验	(203)
一、斗争的广泛、持久、深入	(204)
二、为每个历史时期的无产阶级政治服务	(207)
三、借助于马克思主义的望远镜和显微镜	(211)
四、批孔反儒的战略战术	(218)
后记	(227)

第一章 辛亥革命前后时期的批孔反儒斗争

一、历史背景

鲁迅出生于一八八一年，上距鸦片战争四十一年，这时中国社会已进入资产阶级旧民主主义革命。帝国主义的侵略，使中国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当时尊儒反法还是尊法反儒两条路线的斗争是围绕着维护封建主义还是发展资本主义、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这样两条相反的政治路线而展开的。儒法两条路线的斗争，尊孔和反尊孔的斗争，在每个历史时期都有它的特定的阶级内容和政治内容。

一八五〇年到一八六四年的太平天国革命运动，是对晚清王朝的一次最有力的冲击，也是一次声势浩大的讨孔运动。孔丘被斥为“妖人”，孔孟的经书被目为“妖书”。他们提出：“为政之道，不用孔孟，不用鬼神”（汪士鋐：《乙丙日记》）。他们采取了这样的革命措施：“凡一切孔孟……妖书邪说者尽行焚除，皆不准买卖收藏读也，否则问罪也。”（《太平天国》丛刊（一）第313页。）彻底破除了对孔孟儒生的迷信，大大解放了

人们的思想，推动了以后反孔斗争的进一步发展。

在太平天国革命怒涛的冲击下，使得清朝咸丰帝一再乞灵于孔孟之道，当作救命稻草，命儒臣献上朱熹的《大学讲义》，又编呈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四篇讲义。他亲到孔庙祭祀，召集满汉百官听他讲《中庸》《致中和》一节，妄想用中庸之道来扑灭人民起来造反的烈火。

一八九八年戊戌政变时，鲁迅十八岁，是年四月考入了南京水师学堂，次年便考入江南陆师学堂附设的铁路矿务学堂，在这里接触了严复译的《天演论》等新思潮。当时尊孔与反尊孔两条路线的斗争在政治上表现为封建顽固派和资产阶级改良派的斗争。顽固派反对变法，信奉“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天命论，认为应该一切“率由旧章”，张之洞提出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口号，也就是孔教伦常不能变，西方科学只能来加强这种统治。在改良派中，严复是比较激进的，他在《辟韩（愈）》中，反对儒家道统，直斥历代帝王是“窃国大盗”；认为儒家的所谓“圣人”，都是为帝王统治作辩护的。这也决定了严复介绍进化论的思想基础。谭嗣同反对名教，说：“俗学陋行，动言名教，敬若天命而不敢逾，畏若国宪而不敢议”；抨击“三纲五常”，说：“数千年来，三纲五伦之惨祸烈毒，由是酷焉矣”。他强调变，“昨日之新，至今日而已旧，今日之新，至明日而又已旧，所谓新理新事，必更有新于此者。”他

要求“革去故，鼎取新”，而痛斥“守旧之鄙生，断然曰不当变法。”当时，改良主义主张君主立宪，康有为更是打着“托古改制”的旗号，他们主张渐变，要求“循序前进”，“中国不能躐等而为共和”，他们反对革命，这就决定了他们对封建专制的妥协性。因此，当资产阶级革命派起来推翻封建王朝时，他们大部分堕落成为保皇派了。而且愈益乞灵于孔丘这具政治僵尸，康有为写了《论语注》、《中庸注》、《孟子微》，攻击秦始皇的焚书坑儒。梁启超甘冒向“四万万人挑战”之大不韪，宣称要“爱孔子”，“忠于孔教”，说什么“孔教者，悬明塞天地，而万古不能灭者也。”

辛亥革命兴起，尊孔与反尊孔两条路线斗争在政治上表现为保皇与革命的斗争。孙中山说：“革命、保皇二事，决分两途。如黑白之不能混淆，如东西之不能移位。”这显然是对乞灵于孔孟之道的保皇派的迎头一棒。

以章太炎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直斥孔丘为中国“祸本”，称赞秦始皇是开天辟地以来“另开了大生面”的伟大政治家，说“不燔六艺，不足以尊新王”，称赞商鞅变法，反对“天命论”，提倡“革天说”。他尊法反儒，为推翻封建帝制、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而大造舆论。

伟大领袖毛主席指出：辛亥革命“**有它胜利的地方，也有它失败的地方。**”毛主席说：“你们看，辛亥

革命把皇帝赶跑，这不是胜利了吗？说它失败，是说辛亥革命只把一个皇帝赶跑，中国仍旧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迫之下，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任务并没有完成。”

(《青年运动的方向》) 辛亥革命以后，尊孔与反尊孔两条路线的斗争的阶级内容和政治内容表现为复辟和反复辟的斗争。复辟派乞灵于尊孔，反复辟派必然要反孔。袁世凯、张勋是政治上的复辟帝制派代表；康有为、陈焕章是复辟派的理论上的代表。反对复辟帝制的思想界的代表主要是章太炎。

袁世凯窃取了辛亥革命成果以后，投靠帝国主义，阴谋复辟帝制，自己来当皇帝，于是大搞尊孔活动，作为复辟帝制的舆论。一九一二年，在袁世凯指使下，封建余孽成立了孔教会、尊圣会等反动组织，清末进士、袁世凯的总统府顾问陈焕章为孔教会会长，宣传中国“不可一日无君”，直接为袁贼称帝服务。因此颇得袁世凯当总统时的教育部表扬，批文是：“……当兹国体初更，异说纷起，该会阐明孔教，力挽狂澜，以忧时之念，为卫道之谋，苦心孤诣，殊堪嘉许……”。内务部批语则说：“……该发起人等鉴于世衰道微，虑法律之有穷、礼义之崩坏，欲树尼山教义，以振作民族精神，发起该会，以昌明孔教救济社会为宗旨，并尽纳其事……准予立案……”资产阶级革命派能够容忍这样的批语，放任尊孔派的气焰嚣张，也说明了资产阶级的软弱性。

一九一三年六月二十二日，袁世凯发表《通令尊崇

孔圣文》，说什么“……天生孔子，为万世师表，既结皇煌帝谛之终，亦开选贤与能之始”，同年十一月二十六日，袁贼又发布《圣哲后裔仍旧膺受前代荣典通令》，吹捧“孔子之道，如日月经天，江河行地，树万世之师表，亘百代而常新”，“现值新邦肇造，允宜益致尊崇”，通令“所有衍圣公暨配祀贤哲后裔，膺受前代荣典，均仍其旧”。袁世凯一手撕毁孙中山手订的《临时约法》后，发表所谓“整饬纲纪”的宣言，颁布《复学校祀孔命令》。一九一四年，在袁政府颁布的《教育纲要》中，规定“各学校均应崇奉古圣贤，以为师法，宜尊孔尚孟”；强令中小学必须以《四书》、《五经》为必修课。是年九月，袁世凯发布了《大总统祭圣告令》，通令全国恢复祀孔典礼，叫嚣“惟此孔子之道亘古常新，与天无极，……如布帛菽粟之不可离”，并穿着特制的古衣冠，亲自率领百官，向孔丘行三跪九叩礼。已经堕落为保皇小丑的康有为，以当代孔子自居，主编《不忍》杂志，狂叫“伤教化之陵夷，吾不能忍也。……嗟纪纲之忘绝，吾不能忍也。……慨国粹之丧失，吾不能忍也。……此所以为不忍杂志邪？”。拚命为复辟制造舆论。一九一五年八月，杨度等在袁世凯授意下设立了推行帝制的“筹安会”，与复辟紧密配合的尊孔活动也达到了高潮。孔丘的七十六代孙，所谓“衍圣公”孔令贻，做了“筹安会”的名誉理事。孔令贻受宠若惊，为了报效主子的青睐，曾一再电促袁贼“早日登极。”一份由孔令贻统率孔、

颜、曾、孟四姓“奉祀官”呈政事堂、陆海军大元帅统率办事处，代行立法院、大典筹备处和各部院的电文中说：

“窃维共和国体，既不适用于中华，君主立宪，已征大同于民意，惟我大总统，神圣文武，天与人归，亟宜早正帝位，统驭群伦，……早定巩固之基。此（令贻）等所祷祀而请之者也”袁世凯从一九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起到一九一六年三月二十二日止，做了八十三天的皇帝梦而被永远钉在耻辱柱上。尊孔与复辟的血肉关系，再没有比这个时期表现得更为触目惊心的了。

一九一三年八月章太炎亲自到北京骂袁世凯“包藏祸心”，被袁软禁起来，在软禁中写了《驳建立孔教议》，指出：“今之倡孔教者，又规摹（董）仲舒而为之矣。”又写了《秦献记》，高度评价了秦始皇的历史功绩，说：“藉令秦皇长兴，易代以后，扶苏嗣之，虽四三皇、六五帝，曾不足比隆也。”并正确地指出：“秦政如是，然而卒亡其国者，非法之罪也。”然而章太炎毕竟是资产阶级革命家，后来，没有能跟着时代一同前进，“既离民众，渐入颓唐”，甚至鼓吹尊孔读经，“粹然成为儒宗”。

继袁世凯称帝之后的张勋复辟，同样利用尊孔做“敲门砖”，早在袁世凯阴谋称帝前夕，张勋就在《孔教会杂志》第一卷第一号上写了《上大总统请尊崇孔教书》，说什么“方今国体初更，民情浮动，欲谋统一，明教为先。孔子为吾国宗教初祖，道冠百王、功垂万

祀。……伏乞大总统剀切宣谕，表示尊崇，匪特保存国粹，亦以维系人心。”在他和康有为为废帝溥仪颁布的草诏中，说是“而今以往，以纲常为名教，为精神之宪法，以礼义廉耻，收溃决之人心。”这时，与张勋相勾结的康有为草拟的“请订孔教为国教”的电稿，宣扬“有孔教乃有中国，散孔教是无中国矣。”一九一七年三月，康有为致电北京政府总统黎元洪、总理段祺瑞和内务部“请饬全国祀孔仍行跪拜礼”，甚至狂嚎：“中国民不拜天，又不拜孔子，留此膝何为乎？”但是孔老二的亡灵没有能挽救张勋一伙复辟党的失败，这一幕丑剧只演了十一天就完蛋了。不过这也说明一切反动派复辟派都妄图把孔孟之道作为复辟唯一的精神支柱。

综观辛亥革命前后时期尊孔与反尊孔的斗争，都是围绕着政治上前进和倒退，维护封建主义还是发展资本主义、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复辟与反复辟的斗争而展开的。鲁迅早期的批孔反儒斗争，也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展开的。不但如此，鲁迅在五四运动前后写的小说或杂文，也有不少以这个时期的历史为题材的。因此，对这一时期的历史背景，我们就叙述得详细一点。

二、“孔孟的书我读得最早，最熟，然而倒似乎和我不相干”

一九二六年十一月十一日鲁迅在《写在“坟”后面》一文中回顾自己的思想历程曾经这样写道：“孔孟的书

我读得最早，最熟，然而倒似乎和我不相干。”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鲁迅的话，这是因为有他的全部著作作为证。当然并不是鲁迅天生有什么对孔孟之道的免疫力，这必须从他的生活实践中去找原因。我认为，至少有以下这样三种原因使他很早就对孔孟之道发生反感：

第一，鲁迅虽然出身于士大夫的败落家庭，然而从小就与劳动人民，特别是贫苦农民的子弟交朋友。少年鲁迅常去外婆家安桥头，恰如鲁迅在小说《社戏》中所怀念的，他在这里发现了一片乐土，而可以免念孔丘编的《诗经》之类了。根据乔峰的回忆，鲁迅与农民七斤特别熟，他们曾一起去钓虾或摘豆。一个能编很细巧的竹器兼种沙地的老工人的儿子闰水也是鲁迅要好的朋友。还有一个小名和尚的木工，他还曾经送给少年鲁迅一把木制的象鼻大刀。这大刀鲁迅一直保存着，作为美好的纪念。（见《略讲关于鲁迅的事情》）后来鲁迅自己一再说起，童年在自己“家乡的村子里”“小朋友大抵是农民”。（《准风月谈·电影的教训》）显然，鲁迅在少年时代和手工业工人、农民的接触，他是严肃地把这作为与孔孟之道对立的阶级教育看的，他说过：

我生长于都市的大家庭里，从小就受着古书和师傅的教训，所以也看得劳苦大众和花鸟一样。有时感到所谓上流社会的虚伪和腐败时，我还羡慕他们的安乐。但我母亲的母亲是农村，使我能够间或和许多农民相亲近，逐渐知道他们是毕生受着压迫，很

多苦痛，和花鸟并不一样了。”（《集外集拾遗·英译本〈短篇小说选集〉自序》）

用不着再详细说明，这里所指的“古书和师傅的教训”就是孔孟之道。孔孟之徒对劳动人民的鄙视，是一再为鲁迅痛感不满的，他说过“我们古代的聪明人，即所谓圣贤，将人们分为十等，说是高下各不相同。”（《集外集·俄文译本〈阿Q正传〉序》）鲁迅正是在与劳动人民的接近中，受到了教育，使他萌生了对孔孟之道怀疑以致否定的思想。

第二，鲁迅受法家和进步思想家的影响。荀况的“锲而不舍，金石可镂”（《劝学篇》）的那种一往无前、百折不挠的精神曾受到鲁迅极度的赞扬，并为鲁迅所发挥并终身拳拳服膺，那也就是鲁迅一再提倡的韧性战斗精神。（《华盖集·这个与那个》）对韩非，鲁迅自己也说过，“时而很峻急”，是受了他的影响（《写在“坟”后面》）。“峻急”也就是严明干练的意思，鲁迅一生做事，特别在对敌斗争中，立场鲜明，一点也不避锋芒，一点也没有孔孟之徒的假慈悲伪君子色彩。敌人曾骂他：“要是有人侵犯了他一言半语，他就跳到半天空，骂得你体无完肤——还不肯罢休。”（《陈源致志摩》，转引李何林编《鲁迅论》）其实这正是鲁迅疾恶如仇的一种表现，他自己后来在与现代评论派战斗中就说过：“我要‘以眼还眼，以牙还牙’，或者以半牙，以两牙还一牙，因为我是人，难于上帝似的铢两悉称。如果我没

有做，那是我的无力，并非我大度，宽恕了加害于我的敌人。”（《华盖集续编·学界的三魂附记》）韩非曾认为“当大争之世，而循揖让之轨，非圣人之治也。”（《韩非子·八说》）在阶级斗争中也是这样，只有斗争才能前进。我们有理由说，鲁迅不但十分佩服韩非，而且是受过他的思想的积极影响的。在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也是抵制孔孟之道的免疫力。因此，鲁迅后来读陈寿的《三国志》，对法家曹操十分赞扬。在近代，正如大家所知道的，鲁迅受严复、章太炎的影响是很深的。他们早期都是尊法反儒的。严复所翻译的《天演论》中的进化论观点，鲁迅曾将它改造成为反对倒退、坚持进步的思想武器，在他早期反封建的斗争中，在他还没有掌握马克思主义以前，起过一定的历史作用。

第三，鲁迅对《山海经》这类神话传说以及具有反抗性的民间文艺具有特殊的爱好。他很早就听讲过《西游记》，不用说孙悟空大闹天宫的故事那种反对儒家正统的思想很早就激动鲁迅的心。后来他又在“娱园”友舅舅的书房里，找到了一部《红楼梦》，显然这部具有反儒思想的小说，正如他后来所高度评价的，将“传统的思想和写法都打破了”，毫无疑问，一定会给他影响。鲁迅对能够越出儒家诗教藩篱的屈原的作品特别激赏，对汉代唯物主义思想家王充也很景仰（《见会稽郡故书杂集》），这些反儒文艺无疑对少年鲁迅批孔反儒精神的增长会有一种良好的促进作用。

鲁迅曾说过：“孔孟的书我读得最早，最熟”这完全是事实，他进“三味书屋”，第一件事就是礼拜孔丘，念的完全是“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一套孔老二的经书。

（《朝花夕拾·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但鲁迅接着说“然而倒似乎和我不相干”，这也是事实，鲁迅没有被孔孟之道从精神上俘虏过去。他从少年读书时起，就能清醒地直觉地认识到孔孟之徒所宣传的那一套反动说教的虚伪性。其中最突出的，便是对元朝郭居敬编的《廿四孝图》的反感。这原是一个长辈送给他的，下图上说，开头使他很高兴。但是当他完全弄清这些故事的内容后，便使他由“扫兴”而憎恶，直到三十多年以后，他还诅咒这些狡诈骗人的鬼话，他把它写在《朝花夕拾》中。鲁迅后来回忆说：“我幼小时候实未尝蓄意忤逆，对于父母，倒是极愿意孝顺的。不过年幼无知，只用了私见来解释‘孝顺’的做法，以为无非是‘听话’‘从命’，以及长大之后，给年老的父母好好地吃饭罢了。自从得了这一本孝子的教科书以后，才知道并不然，而且还要难到几百倍。”其中的“子路负米”、“黄香扇枕”，以至“陆绩怀橘”，还不过是钓名沽誉的一般骗术，要做到并不难，做到以后也就做稳了孝子，得到了进身之阶的敲门砖。至于“哭竹生笋”、“卧冰求鲤”，就压根儿引起鲁迅的深刻怀疑，认为完全是在宣传一种骗术。至于“老莱娱亲”、“郭巨埋儿”，更引起特别的反感和憎恶。问题一则以诈骗，一则以狠毒，去教育儿童，怎么

会有好结果呢？前者“正如将‘肉麻当作有趣’一般，以不情为伦纪，诬蔑了古人，教坏了后人。”因此，“道学先生以为他（按：指老莱子）白璧无瑕时，他却已在孩子的心中死掉了。”后者只会使得孩子怕听到父母穷愁，怕看见自己白发的祖母，“总觉得她是和我不两立，至少，也是一个和我的生命有些妨碍的人。”本意是要宣传孝道的，但结果却促使人们对孝道的怀疑和反感，这正如鲁迅所说：“这大概是送给《二十四孝图》的儒者所万料不到的罢。”

历代念叨着孔孟之道的反动派，包括北洋军阀和蒋介石一伙，其实都是把推广“孝”作为达到使自己的死党忠于自己的一种手段的。他们自己当然不会去实行的，因此，“整饬伦纪的文电是常有的，却很少见绅士赤条条地躺在冰面上，将军跳下汽车去负米”。蒋介石后来自己就无异供认了提倡所谓“孝为百善先”的目的，他说：“‘忠孝’就是要忠于党国，”（《对庐山（匪）军官团第三期学员训词》一九三三年九月十二日）“如果对父母不能孝，则对他人必不能爱，对国家必不忠，所谓‘孝悌也者，其为人之本欤！’我们要能行道于天下，必先行孝悌以事父母兄长。”（《出席峨眉（匪）军训团中秋赏月会训词》一九三五年九月十三日）叛徒、卖国贼林彪也认为“忠孝节义”，可以“用其内容”，也就是要动员人们去为他那个反党集团效忠。

三、“从旧垒中来，情形较为看得分明，反戈一击，易制强敌的死命”

鲁迅在《写在“坟”后面》一文中曾经分析了自己的作品，在暴露旧社会弊害方面为什么被读者认为十分深刻，其中的一个原因是“从旧垒中来，情形较为看得分明，反戈一击，易制强敌的死命。”鲁迅一生批孔反儒的斗争能够取得如此辉煌的成果，与这点是分不开的。

首先是在鲁迅于一八九八年春考进江南水师学堂和不久转入江南陆师学堂附设的矿路学堂的读书生活中体会到晚清政治的腐败，所谓“军工路矿，富国强兵”的洋务运动的破产。在水师学堂里，贯彻的正是张之洞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教育方针，除教英文外，汉文就教“君子曰，颖考叔可谓纯孝也已矣，爱其母，施及庄公”。作文题是：《知己知彼百战百胜论》，《颖考叔论》《云从龙风从虎论》，《咬得菜根则百事可做论》，无异于八股试题。最为奇怪的，这学校原有一个游泳池，因为淹死了两个小同学，就因噎废食地把它填平了，而且每到七月，请和尚放起焰口来，算是超度亡魂。这实在是“乌烟瘴气”。于是半年以后鲁迅就转入了矿路学堂，但除了读德语课本外，汉文还是“颖考叔可谓纯孝也已矣”，而且外加朱熹的《小学集注》。这学堂附设了青龙山煤矿，可是掘出的煤，仅供烧两架抽水机用。鲁迅说：